

专题 :中国科学院成立 60 周年

首次国际地球物理年 与一个中国的原则

张九辰 王作跃

摘要 1957—1958 年的“国际地球物理年”是世界范围内首次大规模的学术合作。论文叙述了中国参与及退出这次合作的过程及原因,并着重分析了中国退出后的工作及其影响。文章最后阐述了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原则的演变。

关键词 地球物理 国际合作 中国科学院

1958 年 2 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做了《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报告。在谈到中美关系时,他指出:“自从一九五五年八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以来,已经两年半了。尽管中国在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的积极建议,美国却始终坚持要中国承认美国占领台湾的现状,保持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先在一些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中尽可能地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以便在国际上逐渐形成‘两个中国’的既成事实。早在 1956 年 11 月第 16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和 1957 年 6 月国际地球物理年专门委员会上,美国就已经通过它的追随者进行过这种阴谋活动……”。最后,周恩来强调:“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管这个阴谋在什么场合、以什么方式出现,我们决不容许这个阴谋得逞”。[周恩来 1958]

在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的基础上,如何更好地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是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建院后长期探索的问题。周恩来提到的国际地球物理年,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事例。

作者简介:张九辰,博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王作跃,博士,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教授。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专项“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与编撰”(编号:KACX2-YW-001)。

一 组建“中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

1957—1958年的国际地球物理年(以下简称IGY),是首次大规模的国际科技合作,共有66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其中。这项活动要求世界各国对地球物理现象进行同步观测,互相交流资料,开展国际科学合作。

IGY之前,世界各国分别于1882—1883年、1932—1933年,进行过两次极地区的地球物理现象联合观测,这两次活动被称为“国际极地年”。第二次国际极地年以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尤其是火箭和无线电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地球物理学的研究。1950年6月,国际科学无线电协会(URSI)举行会议,一些学者提议,将50年一次的国际极地年观测改为25年一次。这一提议得到了国际科学联合会(ICSU)等国际性学术组织的支持,并规定从1957到1958年世界各国共同对南北两极、高纬度地区、赤道地带和中纬度地区,进行一次为期18个月的联合观测。国际科学联合会将第三届国际极地年改名为“国际地球物理年”。

1954年在维也纳召开的“1957年7月—1958年12月国际地球物理年准备会议”,正式确认“国际地球物理年”的观测时间为1957年7月1日至1958年12月31日。为此,国际科学联合会在其下设立了特别委员会(CSAGI),负责全面规划观测项目、技术指导和出版资料等工作。特别委员会由英国地球物理学家查普曼(S. Chapman)任主席,美国物理学家伯克纳(L.V. Berkner)为副主席,比利时科学家尼古莱(M. Nicolat)为总秘书。

IGY涉及内容广泛,包括气象学、地磁和地电、极光、气辉和夜光云、电离层、太阳活动、宇宙线与核子辐射、经纬度测定、冰川学、海洋学、重力测定、地震学、火箭与人造卫星探测等。为了组织并推进工作,各国分别成立了本国委员会。

1952年12月,国际特别委员会致函中国科学院,希望中科院组织一个国别委员会,负责筹备观测活动。为此,中科院积极与紫金山天文台、地球物理研究所、地理研究所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等单位协商。经过反复讨论后,“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我国是否参加应取决于苏联是否参加”^①。在确定了基本原则之后,中科院决定在与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以及外交部等机构联系的同时,积极与苏联沟通。

在向中国发出邀请时,国际特别委员会已经向苏联发出了同样的邀请。那时西方组织认为,与苏联方面合作有两个障碍:一是西方人认为苏联有大国沙文主义的

^① 关于我国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的文件. 中国科学院档案. 案卷号 1956-4-52.

文化政策；二是苏联科学院在冷战期间与国际科学联合会联系很少。但是，西方人也知道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力，希望能够得到苏联的支持。[Bulkeley 2008]

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对国际特别委员会的邀请作出积极的反应，并于1954年8月在苏联科学院建立了“苏联国家地球物理年委员会”。1955年3月，苏联给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发函，告知苏联科学院已经组建了“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信中还询问各国是否参与。在苏联之前，只有捷克和南斯拉夫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加入。在苏联的影响下，除阿尔巴尼亚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加入了IGY。[Bulkeley 2008]

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也接到了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兼苏联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主席巴尔金(Бардин, И.П.)院士的来信。而此时，正在中科院工作的苏联地质学家别洛乌索夫(Белоусов, В.В.)，也积极建议中国参与这项活动[竺可桢 2008a, 页115]。在得知苏联的态度后，中科院决定参与IGY的工作。

1955年6月召开的中科院第26次和第29次院务常务会议，讨论了参加IGY活动的意义，并决定参加IGY的活动[陈斯文、陈雅丹主编 2008, 页279]。中科院深知参与国际活动的主要障碍是台湾问题。院党组就此专门向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外交部、对外文化联络局请示，提出先参加有关国际合作，如果台湾方面参加，再提出抗议或退出有关合作。在得到有关部门的同意后，1955年9月3日，竺可桢致函国际特别委员会。他在信中表示，中科院决定参加IGY的工作，并成立了“中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信中特别询问了台湾方面是否参加，并明确表示：“我院‘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开会时，委员们一致意见认为：国际地球物理年如有台湾参加，我们则碍难参加。”9月8日，国际特别委员会回复竺可桢，表示“欢迎你们积极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的科学工作计划。依照CSAGI组成的基本政策，CSAGI已经邀请了所有地理区域的科学家来参加，为了完成一个真正全世界性的地球物理研究方面的努力，更好地了解我们的自然环境。国际地球物理年的科学工作计划在性质上是非政治的，在规模上是全世界的。因此中国科学院和台湾的科学工作组将与所有其他(工作组)同样被CSAGI欢迎”。信中并没有回答竺可桢的询问。但是在第二天，即9月9日，该委员会又给竺可桢发电报，告知台湾方面没有成立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①

于是，中科院开始积极筹备参与IGY的活动，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有力支持。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这次活动“我们要实事求是，要善于藏拙，一鸣惊人”[竺可桢

^① 关于对国际地球物理年采取态度问题的报告及来往函件。中国科学院档案。案卷号 1955-1-30。

1989a, 页 696], 中国学者也希望“抓住这个机会冲破封锁, 发展自己, 跻身国际舞台”[刘成瑞 2007]。为了参与工作, 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相关机构也积极配合中国国家委员会, 以保证观测工作的顺利进行。邮电部负责组织通讯网, 保证联系; 国家测绘局增设了地磁普测处, 协助地磁测量工作; 中科院干部局配备了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国国家委员会办公室的专职干部, 负责协调相关工作。^①

中国委员会成立以后, 立即着手筹建观测台站。除了一批已有台站外, 又先后完成了北京、拉萨、广州、兰州等观象台的勘选和新建工程。拉萨台站的建立, 完全得益于中国对 IGY 的有力支持。当时西藏地方社会治安不靖, 也无电力供应。为了建立观测台站, 中国委员会专门从国外进口了牵引式发电机组。观测台选在拉萨西郊“七一”农场果园内, 果园无条件让出场地。台站的基建材料、仪器设备、食品用品, 由总后勤部调派车队, 从兰州出发, 穿越柴达木盆地和昆仑山运往拉萨。车队司机都是从朝鲜战场回国后转业的老战士, 人人配备了冲锋枪、手榴弹。正是这种有力的保障, 使拉萨台站仅用半年时间, 就建成了当时“拉萨甚至西藏最漂亮的现代建筑群”。开始观测以后, 正值西藏平息武装叛乱的特殊时期。有些时候, 观测人员不得不“在火力掩护下, 通过暗沟地道, 去 200 公尺外的仪器室, 坚持观测和准时换记录, 确保资料连续可靠, 数据不间断”。[刘成瑞 2007]

为了与国际学术界更好地交流, 中国委员会先后派出多个代表团参加有关的国际会议。1956 年 8 月, 中国委员会第一次派出由陈宗器、朱岗昆、吕保维以及工作人员等 6 人组成的代表团。代表团成员先到莫斯科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东欧区域会议, 并与苏联委员会互相交换研究计划和研究经验。莫斯科会议结束后, 代表团成员又参加了布鲁塞尔的国际科学无线电协会地球物理年委员会会议, 和巴塞罗那的第四届国际地球物理年专门委员会会议。中国代表在国外广泛接触同行学者, 参观了有关的学术机构。对于几个会议他们的感受很不一样: “出席莫斯科和巴塞隆[罗]那会议, 代表团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在莫斯科时, 出席会议者均为兄弟国家的代表, 开诚相见, 行动自如, 毫无拘束。在巴塞隆那, 则出席者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占大多数, 开会发言和会外交谈, 处处要小心谨慎, 要提高警惕”。他们指出, 在会上“美国积极支持大气中核子辐射观测, 理由很冠冕堂皇, 实际上他们另有打算”(意指美国试图借 IGY 辐射观测来监视苏联的核试验和中国可能进行的核试验), 认为这是典型的“表面是一套, 内幕中另有一套”。在参加了布鲁塞尔和巴塞罗那的会议之后, 中国代表深感社会主义国家对科学研究的大力支持: “除美

^① 关于我国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的报告, 见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编:《中国科学院年报·1956》, 页 182—188。

国政府别有用心之外,一般而论,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科学经费的支持远比社会主义国家为少。甚至有些国家的政府(像法国),不肯为科学机关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增加经费。”^①

二 美国操纵下台湾的介入

1957年2月25日至3月2日,国际特别委员会要在日本东京召开年会和西太平洋区域联络会议(以下简称西太平洋会议)。正当中国学者紧锣密鼓地准备参加会议时,2月5日台湾方面致函国际组织要求参加会议,10日又向国际组织匆忙提交了研究计划和地球物理年委员会成员名单。按照国际特别委员会的说法,早在1952年就已经发函邀请台湾方面参与,但从未得到他们的回复[Sullivan 1961, p. 38]。中科院所掌握的信息也表明,曾到台湾参观的美国学者认为:“台湾科学基础薄弱,经济困难,很难为IGY做任何些微的贡献。”^②

从未关注过IGY的台湾,在距离活动正式开始仅几个月才匆忙提出加入申请,这与美国的干涉密切相关。1956年9月,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办公室主任,曾任美在华外交官、美驻上海领事的麦考基(Walter P. McConaughy),从美国驻西班牙大使处了解到IGY的活动有新中国政府参加,而没有台湾方面的人员。麦考基马上与台湾方面联系,提出台湾应该参加这项活动[Doel 2005]。可能在巴塞罗那会议期间,美国人就把这种想法转告了相关的组织者。国际特别委员会主席查普曼,是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朱岗昆当年在牛津留学时的导师。据朱岗昆回忆,有一次与查普曼一起散步,查普曼提到台湾可能也要参加这次活动,并询问朱的意见。朱岗昆当即表示反对,并反问到:“如果英伦三岛都以英国的名义参加这次活动,你是否会同意?”^③

从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看,台湾正式提出加入这项国际活动的时间,是在西班牙会议结束3个月以后,即1956年底。台湾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致函国际特别委员会,他在信中提出,台湾是国际科学联合会的成员,希望参加这项国际活动,并要求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外。他表示:台湾拒绝与中国大陆“面对面地坐到一起”。[Sullivan 1961, p. 37]

① 关于我国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的报告,见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编:《中国科学院年报·1956》,页182—188。

② 中科院关于参加和退出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和该会所组织的活动的有关文件。中国科学院档案。案卷号1958-1-40。

③ 王作跃、张九辰在北京中关村访问朱岗昆先生记录,2007年8月27日。

朱家骅的信引起了国际特别委员会的担忧。他们认为,台湾方面在过去四年中从未关注过 IGY 的活动,仅仅是因为政治原因才开始介入。而 IGY 就是要反对任何政治性的干扰,国际特别委员会担心这样会引起东西方的敌视,并削弱 IGY 的科学工作。为此,尼古莱 1957 年 1 月致函朱家骅,提醒他国际特别委员会早在 1952 年就曾邀请台湾参加,并强调这项活动不是政府行为、没有政治动机。[Sullivan 1961, pp. 37—38]

台湾方面的动作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注意。1957 年 2 月 16 日,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发文给中科院党组,他们从驻苏使馆和驻英代办处了解到台湾方面的动向,并指示中科院党组:“一,电告驻英代办处向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主席表示,我国坚决反对台湾蒋邦参加,如果该委员会容许蒋邦参加,我国将退出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和不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的全部活动;二,迅速电告日本方面我们的态度;三,以上两点同时电告驻苏使馆转告苏联科学院和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的苏联委员会”。经过交涉,日本方面与国际特别委员会最后决定,以台湾尚未参加国际特别委员会总机构为由,要求台湾不能派遣正式代表出席会议。台湾方面对这个决定表示不满,并以台湾驻日本大使名义向日本外交部提出抗议,美国驻日本大使也为此向日本外交部提出了抗议,但是日本没有改变决定。^①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代表团才得以出席东京会议。通过参加会议,中国代表看到了地球物理科学的国际水平[赵九章 1957],初步认识到在地球物理科学方面赶上国际水平的方向、步骤以及必要的措施。但是在西太平洋会议上,两个中国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拒绝台湾代表参加而结束。会议分为 12 个小组,中国担任了两个小组的组长,其他组长由日本和美国代表平均分担。在美国代表负责的小组讨论中,仍安排在台湾设立观测站。虽然在中国代表的要求下,取消了台湾观测站,但是“美国代表对某项决议案取消台湾字样采取保留态度”。^②

会后,台湾方面更是不断向国际特别委员会发函,强调台湾要加入该项活动;中国大陆方面也一再表明反对立场。直到 1957 年 6 月中旬,国际特别委员会最后做出决定,接受台湾加入。鉴于此,1957 年 6 月 29 日,中科院副院长、中国国家地球物理年委员会主任竺可桢致函国际特别委员会。信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国家对 CSAGI 执行局擅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国家委员会改成中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北京),并承认所谓‘台北中国科学院’作

① 中科院关于参加和退出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和该会所组织的活动的有关文件。中国科学院档案。案卷号 1958-1-40。

② 国际地球物理年西太平洋会议。中国科学院档案。案卷号 1957-4-63。

为中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台北)参加 CSAGI ,提出严重的抗议。”信中还进一步指出:“这种把国际科学合作活动屈从国际上某种势力制造‘两个中国’阴谋的错误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国家委员会是绝对不能同意的。现在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国家委员会正式通知您:我们坚决要求撤消这一错误决定,在这决定未被纠正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国家委员会决定退出 CSAGI 和它的一切活动”[竺可桢 2004,页 364],《人民日报》同时刊登了抗议信。^①

抗议电文发出后,在 7 月 5 日国际特别委员会东南区委员会复印并分发给参加者的地址名单上,仍将中国北京、中国台北并列。于是竺可桢又于 8 月 19 日给该会主席卡普曼再去一封抗议信,要求正式退出该组织。卡普曼于 9 月 16 日复信婉言同意。但同年 12 月,该会秘书处发给各国参加该会组织委员的一份“1957—1958 年各国出席国际地球物理年代表名册”时,也分送给中国的各个委员,并专送了一本给中科院秘书长,该名册仍将北京与台北并列。为此,中科院又在 1958 年 1 月拟定了抗议电,发给国际特别委员会,并将电文送新华社发出消息。^②

三 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国家地球物理年委员会”后的工作

中国退出以后,“中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国家地球物理年委员会”,相关的组织工作交由中科院地球物理所负责。委员会决定各项工作仍照原计划执行,所有观测资料“除兄弟国家外,绝对不与资本主义国家交换,因而可引起各国科学家对国际地球物理年专门委员会的错误表示不满”;“一般材料照常广播,但为国际地球物理年世界日所增加的观测资料,不广播,除兄弟国家外,不交换”^③。委员会还认为应该建立一个中国地球物理年资料中心,以利于综合收集资料。中国虽然退出了国际组织,但要为下一次国际地球物理年做准备。[竺可桢 1989b,页 103]

尽管国际特别委员会一直在努力避免这项工作受到政治的影响,最后仍然由

^① 竺可桢电国际地球物理年专门委员会 抗议它屈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人民日报》,1957年6月30日,第1版。

^② 国际地球物理年西太平洋会议. 中国科学院档案. 案卷号 1958-4-72.

^③ 中科院关于参加和退出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和该会所组织的活动的有关文件. 中国科学院档案. 案卷号 1958-1-40.

于政治问题,迫使中国退出了国际合作。但是中国退出之后,原定的各种观测活动照常进行。中科院仍然与苏联、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交换资料,其中以人造卫星观测资料为主,只是不再使用“国际地球物理年”的名义。

中国委员会的建立,对中国地球物理学的发展影响深远。1953年,苏联科学院代表团访华时曾指出:“中国的地球物理学研究工作,除已有长久历史的气象学以外,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现在所用仪器是太陈旧了,已不能符合现代要求”^①。为参与地球物理年活动,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外汇从国外购置仪器设备。仅一年左右,多数观测台站就装备起世界最先进的观测和记录仪器。更为重要的是,此次活动推动了中国地球物理学各分支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培养、锻炼和提高了科技人员的业务管理水平和组织能力,检查、发现了以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改进的地方,促进了中国观测项目统一标准化的提高,改善了观测的条件,加强了仪器的维修,推动了相关观测仪器检定工作的发展,获得了大量宝贵的资料,为其后的科研工作以及开展国际交流创造了条件。

到1959年底,中科院几乎组织完成了国际特别委员会规定的各项观测内容(见表1)。其间,原声明参加的工作有9项(表中画√者);不在计划之内,后来增加的项目有5项(表中画○者)。那些最初没有列入计划的项目,由于各种原因也做了工作,其中有些与IGY有关,而且是在与苏联的合作中带动起来的。例如,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中科院为了开展人造卫星观测及预报的研究工作,成立了人造卫星光学观测办公室,并且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陆续成立了26个光学观测站^②;但是也有一些工作开始没有列入中国的IGY计划,后来退出IGY后才开展的,如海洋学、冰川学等。在1956年底制定计划时,由于没有考察船,再加上美国对中国沿海的封锁,中国无法开展这方面的工作[竺可桢2004,页329]。到了1957年,中科院已经有条件开始在中国近海进行多船同步的观测。1958年9月开始,“每月均有几十艘船进行着几百个测站的海洋综合调查”^③。到1959年底,中科院基本上组织完成了调查中国各海区的海流及水文特征的工作。又如,“大跃进”中为西北干旱地区寻找水源、改变西北地区的落后面貌,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为此中科院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冰川考察和融冰化雪试验,从而推动了中国冰川学的发展。

① B. B. 别洛乌索夫 1953. 对中国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现状的一些意见. 见中国科学院编印.《苏联科学院代表团访华资料汇编》。

② 关于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的有关文件.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档案. 案卷号 Z376-151.

③ 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主编 1959, 页 179。

表 1. 国际地球物理年的主要观测内容

	1957 年中科院计划参与的工作	1959 年中科院拟定的报告内容 ^①	台湾地区报告内容 ^②
世界日	√	√	
气象	√	√	√
地磁	√	√	
极光与气辉	√	√	
电离层	√	√	√
太阳活动	√	√	√
宇宙线	√	√	
经纬度	√	√	√
冰川		○	
海洋		○	
卫星观测		○	√
地震	√	√	√
重力测定		○	
原子核辐射		○	√

不可否认,退出国际合作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首先,它使这项工作失去了在国际上展示中国实力的机会,进而也就失去了来自国家层面的有力支持。虽然有关委员会还存在,但它隶属于地球物理所,缺乏对院内外各机构强有力的组织与领导力量。“大跃进”开始以后,地球物理所的工作重点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发生了改变,该所的核心研究力量随之转移。

其次,资料的汇集出版也缺乏强有力的监督领导,没有能按照原来的规定执行。从 1955 年决定加入到 1959 年,中国委员会会议共召开过 12 次。前 9 次会议都是在退出之前的两年内召开的。退出以后,只召开过三次会议。按照规定,各小组的观测资料每个月都要向委员会提交报告。但实际上只有世界日电离层和天文黑子数两部分按照规定提交了报告;气象方面的报告 1957 年 9 月以后未再提交,地磁、地震方面始终没有提交报告 [竺可桢 2008b, 页 99]。在 1959 年 2 月召开的第 12 次委员会会议计划编制《中国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工作报告》,这项工作也因陈宗器的去世无形停顿。1960 年 7 月 19 日,中科院组织 IGY 工作总结,但各方面的资料仍由各部门分别保管,未曾统一刊印 [竺可桢 1989b, 页 525]。气象小组的工作更是相对独立,不归中科院领导,由中央气象局组织相关工作,并单独开会。

尽管如此,首次国际地球物理年对中国地球物理学研究仍然产生了深远的影

① 竺可桢 1989b, 页 525。

② 据《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国[台湾]委员会工作报告书》,台北,1959 年。

响,初步形成了地震、地磁等骨干台站的框架布局,培养出一批地球物理学家。在中国学者的积极推动和不懈努力下,许多观测工作长期坚持下来。正是以首个国际地球物理年为起点,各台站连续出版了数百卷《观测报告》,为中国的地球物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连续性的工作也最终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肯定。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观测活动的余山地震台,于1985年获得国际地磁学和高空大气学协会授予的“国际地球物理观测百年纪念”金质奖章,拉萨、北京等7个台站获得银质奖章。

四 一个中国原则下的国际学术合作

1957年开始的“国际地球物理年”,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学术合作。此时的中科院经过五年多的建设,也进入了兴旺发展时期。但是由于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国失去了这次跻身国际舞台的机会。1957年退出有关国际观测以后,中科院的学者没有再参加任何与此项工作有关的国际会议。1958年,国际地球物理年活动结束。由于频繁的太阳活动引起了一系列日地扰动事件,联合观测活动又延长到1959年,称为“国际地球物理合作”(IGC),并专门成立了“地球物理协会间合作专门委员会”(SCG)。该委员会成立后,曾经邀请中科院参与其中,苏联、欧洲等国家也多次邀请中科院派代表参加有关的学术会议^①。但是除了与社会主义国家交流部分资料外,中科院基本上没有参与这方面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文革”之前,中科院主要是与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外,这也与一些国家有意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政治问题有关。这个时期,中科院参与国际学术活动的原则是:凡是有台湾为会员的国际组织召开的会议,不管有无台湾人员出席,中科院的代表均不参加;凡是邀请台湾人员参加或已有台湾人员报名参加的会议,中科院也不派代表与会。

此时的台湾,却在积极申请加入各种国际学术组织,争取占居席位。由于中国近现代科学起步较晚,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还不是一些国际学术组织的会员。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以后,开始申请加入各种国际学术组织。从50年代末期开始,台湾方面多次向国际大地测量学与地球物理学联合会(IUGG)提出入会申请。而国际方面因为在接纳中国大陆还是中国台湾的问题上意见不一,暂以“时机尚未成熟”委婉拒绝了台湾。但是台湾方面仍然不放弃入会的努力,积极与

^① 关于我反对蒋介石政府企图活动参加在苏联举行的国际地球物理年专门委员会会议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案卷号 113-00321-01(1)。

IUGG 的各会员国联系。1967 年 9 月,台湾方面派遣阮维周及有关人员,参加了在瑞士召开的 IUGG 大会。会议期间,他们“把所有与会国家的首席代表和住处都搞清楚……逐位去拜访,请予支持”[阮维周 1992,页 95]。最终,台湾方面于 60 年代末加入了该组织。

70 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开始积极参与国际学术组织。而台湾方面,则在 70 年代末期由于中国大陆的加入,先后被排除了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IUGS)、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学联合会(IUGG)等国际组织的会籍。197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被动。为此,台湾中研院于 1979 年组织起国际关系小组会。小组会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设法维持台湾在“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ICSU)的会籍。1979 年,小组会特地邀请国际科联主席和秘书长访台,参观中央研究院等科研机构。为了避免“两个中国”的问题,国际科联建议台湾中央研究院放弃长期使用的 Academia Sinica,改为使用 The Academy located in Taipei。为了保持会籍,台湾方面在自行行文保持原状的情况下,同意了国际科联的改名建议^①。[阮维周 1992,页 99、102]

科学的发展需要国际性的交流。为了推动中国学者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在国际学术合作中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1972 年,周恩来亲自批准恢复地震观测资料对外交换;1978 年以后,邓小平等 9 位中央领导批准“扩大我国地震、地磁资料对外交换”[刘成瑞 2007]。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科院在学者参与国际学术会议方面也开始采取比较灵活的作法。只要会议不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问题,而台湾科学家又仅以个人身份参加,中科院的学者都可以赴会。

台湾方面也在加入国际组织中表现出了一些灵活性。例如,在早期参与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学联合会时,台湾方面使用的名称是 Chines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IUGG。在被排除会籍之后,台湾方面为了能够重新入会,在名称中删去了 National,在其它一些已入会的国际组织中,台湾方面也在过去的名称之后加上了 located in Taipei。[阮维周 1992,页 103]

1979 年,由王应睐、邹承鲁等中国生物化学学会领导人与国际生化学会和来自台湾的科学家在多伦多达成协议,使得中国大陆以中国生化学会(The Chinese Biochemical Society)的名义加入国际生化学会,但允许台湾科学家以中国台北生化

^① 台湾有关部门曾极力反对台湾中研院使用 located in Taipei 的名称。直到 1987 年,中研院国际关系小组会的成员与台湾负责外交事务的有关人员还曾经发生过争论。

学会(The Biochemical Society located in Taipei, China)继续其成员资格,二者并列在中国名下。此多伦多共识很快就被推广到国际科学联合会所属的各个国际科学学会,成为中国大陆和台湾参加国际科学活动的主要组织模式。[熊卫民、邹宗平 2008,页 114、190—192]

当 2007—2008 年国际极地年(即第二次国际地球物理年)再次来临时,中国政府和科学共同体,包括中科院的科学家积极参与了各项活动。宽松、开放的国际交流环境,为中国学者了解国际学术动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跻身国际学术舞台创造了条件,进而也促进了中国科学的发展。

致谢 本文是在 2007 年 10 月美国华盛顿斯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举行的“让科学全球化:对历届国际极地年和国际地球物理年的社会和智识方面影响的新考察”(Making Science Global: Reconsidering the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Implic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ar and Geophysical Years)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Geophysical Year)基础上扩充改写而成。感谢朱岗昆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也感谢 Rip Bulkeley、Ronald Doel、会议的组织者和其他参加者的反馈意见。

参考文献

- Bulkeley, R. 2008. Aspects of the Soviet IGY. *Russian Journal of Earth Sciences*. (10). available at: <http://elpub.wdcb.ru/journals/rjes/v10/2007ES000249/2007ES000249.pdf>.
- 陈斯文、陈雅丹主编 2008. 科学规划第四组,关于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的紧急措施的建议. 见《摘下绽放的北极星:纪念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陈宗器先生诞辰 110 周年》(下).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Doel, R. et al. 2005. National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Science: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Science Congresses in Hitler's Germany, Stalin's Russia, and Cold War United States. *Osiris*. (20): 49—76.
- 刘成瑞 2007. 深深沉思往事的意义,才可以认清现在——纪念国际地球物理年(IGY)50 周年,缅怀开拓者.《地震地磁观测与研究》. 28 (6): 109—114.
- Sullivan, W. 1961. *Assault on the Unknown: The International Geophysical Year*. New York: McGraw-Hill.
- 熊卫民、邹宗平 2008.《邹承鲁传》. 北京:科学出版社.
- 赵九章 1957. 国际地球物理年西太平洋区域联络会议.《人民日报》. 1957 年 4 月 6 日. 第 7 版.

- 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主编 1959.《十年来的中国科学·综合考察》.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周恩来 1958. 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人民日报》. 1958年2月11日. 第1版.
- 竺可桢 1989a.《竺可桢日记》(3).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竺可桢 1989b.《竺可桢日记》(4).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竺可桢 2004.《竺可桢全集》(3).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 竺可桢 2008a.《竺可桢全集》(14).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 竺可桢 2008b.《竺可桢全集》(15).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